

“整体”的思想：新时代海外中国学研究断想*

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步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由边缘逐渐向世界中心移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250）的阶段性成果。

国;与此同时,推进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形成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正成为学术的新使命。基于此,我们实有必要回溯并审视已有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以思未来之研究方向。

一、百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进路的历史嬗变

1902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对桑原鹭藏、那珂通世、藤田丰八等日本学人所著东洋史或“支那史”逐一点评,^①由此开启国人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与研究。百余年来,中国学人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大体可划为四个阶段,^②且每一历史阶段的研究进路各有不同,呈现鲜明的时代气息与印迹。

第一,基于学术角胜的动态追踪与学术书评。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之中。身处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强烈焦虑感。孟宪承在讲演《欧洲之汉学》时即称,“为什么我国的学术要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为什么我们要外国人寻出路来我们去跟着它走?耻辱,这是我们极大的耻辱!”他还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是要建筑在它的学术上面。”^③与此同时,清末民初正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时代,通过与西方接轨以重新激活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活力,成为彼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取向。由此,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实际上处于一种紧张或矛盾的状态,一方面需要捍卫“先民所创造或记述下来的学术遗产”,不愿丢失对其阐释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面对西潮的冲击,又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西方,引入和取鉴西法以接续西史的潮流,藉此与其展开国际竞争,力图在新的文化世界中找寻到自己的定位。

正是缘于这样一种社会与学术环境,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一方面热衷于译介域外汉学的著述及其研究动态,彼时的《史学消息》《图书季刊》《北平图书馆馆刊》《食货》《禹贡》等刊物,无不刊有域外汉学的资讯及译文,其原因正如时人所慨叹的那样,“欧美汉学家能以科学方法处理史料,其研究之精细,立论之精辟,多为国人所不及;又如日本学者之研究中国学术,其精密处虽不如西人,然取材之赅博,刻苦不苟之精神,殊足供国人所借镜。”^④另一方面,彼时中国学人对撰著评述域外汉学著述的书评亦极有兴趣。笔者粗略统计,评述域外汉学著述的书评数量超两百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人在所撰学术书评中,常以相当的篇幅指摘域外汉学著述的缺失。这似乎是暗示中国学问的正统仍在中国,力图打破外人对中国学问的话语权。

第二,基于学术批判的有限了解与著述翻译。随着冷战的开启和1949年中国的政权鼎革,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成为彼时最主要的任务。“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其制定颁行的暂行简章中就明确指出,学会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⑤创刊于1949年的《新建设》杂志在《发刊词》中明言,“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应该从建立新观点、

①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101页。

② 具体参见吴原元:《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及其启示》,《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吴原元:《百年来中国学人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进路及其反思》,《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③ 孟宪承讲,虞斌麟记:《欧洲之汉学》,《国学界》创刊号,1937年5月。

④ 《本刊下年度编辑计划》,《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1937年7月。

⑤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新思想做起。”^①此时不再是“西人方法之精密,可供吾人仿效,西人治汉学之成绩,可供吾人参考”,海外中国学丕变为被批判的对象。周一良即言,西洋汉学家或是“直接替侵略者和殖民者服务”,或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某些可资利用的资料,起着间接为侵略服务的作用”;^②韩振华更指斥美国中国学“为扩张主义服务”,称美国的汉学家“是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文化特务,是破坏抢劫中国文化艺术的强盗”。^③

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仅限于极为有限的著述翻译和动态了解。创刊于1958年的内部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虽以摘译方式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动态予以介绍,但至1966年停刊,其摘译的数量不过区区数十篇;1949年至1978年所译的域外汉学著述,亦不过百部。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动态了解还是著述翻译,都系服务于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就明确其任务主要是“为了解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伪社会科学和现代修正主义提供材料”。^④《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一书的编译者,在“序言”中申明其编译乃是“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⑤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需要,成为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显著特点。

第三,基于学术追赶的著述译介与学术史探研。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门的重新开启,学术界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迫切希望了解域外中国学的研究动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编者这样写道:“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如此方能“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⑥

由是,以了解域外中国学为旨趣的“情报型学术”成为此时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主潮。彼时的中国学人,或致力探明域外中国学的概况与动态,或致力编撰海外中国学研究工具书,或致力推出主题不一的海外中国研究译丛。1996年,李学勤提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⑦此后,严绍璁、葛兆光、朱政惠、张西平等基于各自学科情况,亦都强调用学术史方法对海外中国学展开探研。比如,严绍璁基于比较文学的视角,强调要关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文化语境”,树立“学术史”观念,重视研究文本的原典性问题。^⑧朱政惠从史学史研究的进路,就重要中国学家及著述的历史观点、研究方法、史学思想等进行评析。由此,学术史探研成为域外中国学研究的潮流,或梳理各国中国学发展演变,或就域外汉学家及其著述展开探研,或就某一专题展开梳理。

① 费青:《发刊辞》,《新建设》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

② 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③ 韩振华:《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美国“汉学”》,《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④ 本刊编辑部:《一年的回顾》,《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年第8期。

⑤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编者的话”,第1页。

⑦ 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序”,第3页。

⑧ 严绍璁:《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

第四,服务于话语权提升的域外传播与阐释批判。新时代以来,基于时代变化及研究现状,学术界开始对海外中国学已有研究展开反思。朱政惠即言,“一开始是‘不要落后’、‘不要不知天下事’的追赶意识”;第二阶段是“不要迷失自己”,“应该有批判意识和民族自主立场”;“第三阶段就是现在了,是努力确立自己话语权的阶段”。^①张西平持相同观点,“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已经走出了对海外汉学陌生的阶段,因而长期存在的追随海外汉学的倾向应该结束了,平等地与汉学家对话、务实地与汉学家切磋学问的时代开始了”。^②王战亦认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旨在改变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来对西方话语亦步亦趋的自身‘失语’状态。”^③王学典尖锐地批评道,“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西方理论思想的‘殖民地’”,人文社会科学理应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回归。^④

在时代需要与反思之潮的双重作用下,爬梳海外中国学的历史脉络,钩沉学术的传承与衔接虽仍被关注,但已不再是流行的风尚,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种取向:一是追踪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流播及翻译,以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性意义;二是梳理评析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创中国理论与实践的认知、解读与评价;三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中国自身的国情与实践,强化中国知识的“自塑”,以便在全球化场域中表达中国声音。简言之,向世界宣传中国文明与理论实践,展示其对世界的影响和意义,以提升中国形象和国际话语权,正成为时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潮流。

二、新时代海外中国学研究何以需要“整体”思想?

由前述回顾可知,历经百余年发展,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已取得长足发展。遥想民国时期,除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外,没有一部以域外中国学史为主题的论著,可以说全无书写域外中国学史的概念;今天,域外中国学研究则蔚然成风。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尹汉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译著和专著达8100多部,其中研究专著2000多部,^⑤而海外中国学的译文及研究论文则逾万篇。

然而,在看到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更需要认识到已有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比如,囿于方法和视野,已有研究在梳理海外各国中国学的历史演变时,尚无法贯通,多作“平面化”的、条陈式的概况叙述;就重要中国学家所作的个案研究,又多有拔高甚至美化的倾向,未能将其置于汉学的学术史脉络中进行考辨。又如,在评析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创理论与实践时,已有研究多以摘录方式综合所截取的相关论述,缺乏应有的文本语境与思想语境的分析。再如,国内就海外中国学研究所生产的知识不可谓不宏富,然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了解与认识依然是“碎片式”的,缺乏对域外中国学及其再研究的有效总结与提炼,以致时至今日,以民族国家范式书写的总论性著作仍不外乎是何培忠主编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张西平主编的《西方汉学十六讲》等,具有贯通

① 朱政惠:《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② 张西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1978—2019)》,《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③ 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

④ 王学典:《重塑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齐鲁晚报》2018年5月6日。

⑤ 尹汉超编:《海外中国研究中文书目(1978—2018)》,学苑出版社2022年版。

性的全球海外中国学通史依然付之阙如。

面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时代的需求与召唤,笔者以为新时代海外中国学研究急待树立“整体”思想。所谓“整体”思想,意指将海外中国学视为融“外学”与“内学”于一体的有机体,既要注意从“外学”的角度将其置于所在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又要关注其与中国学术的内在联系,视其为中国知识生产的有机部分,以融通与批判为旨趣加以审视和吸纳;在强调以“学科化”方式推进研究的同时,必须打破“学科拜物教”,保有“完整性意识”,并从多元路径窥探海外中国学的完整图景。之所以需要具有这种“整体”思想,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深化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内涵使然。在葛兆光看来,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①因为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及方法不仅与其本国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亦受本国和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两国关系的制约。海外中国学的“外学”属性,要求我们在对其展开研究时应有“整体”思想的观照。比如,对重要汉学家及其论著的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对其个人生平及论著的梳理,仅就其论著评析其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而不追寻其学术思想形成的源与流,将其置于该国汉学发展脉络乃至国际汉学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则无法读懂其论著,无法了解其问题意识的产生,更遑论对其学术思想和学术价值作出恰当的评价;又如,我们在梳理中国文化典籍的域外传播时,如果仅限于爬梳典籍在域外流布概况与评论典籍的翻译技巧和方法,而对典籍域外传播背后的时代思潮及其对所在国的社会文化影响一无所知,便无法透视其中国文化观及其流变;再如,梳理域外对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与评价时,如果我们仅局限于文本爬梳,而不进入文本形成的时代语境和思想语境,则同样难言对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域外影响有深入了解。惟有借助“整体”思想的观照,我们的研究方能跳脱出简单的介绍性层面,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阶段。

其二,克服海外中国学研究“碎片化”倾向使然。为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学术界积极倡导学者从各自“所从事的专业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即所谓“文学从文学的角度去突破,历史学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突破,哲学从哲学的角度去突破,政治学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突破……只有注意从自己所擅长的学科深入下去,才可能产生好的学术成果”。^②

毋庸讳言,“学科化”极大推动了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确是我们所应遵循的取径。然而,在推进“学科化”的同时,我们亦应警惕由此带来的“碎片化”倾向。因为各学科介入海外中国学研究时,多将其视为本学科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延伸。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海外中国学研究并不只是“中国学术研究”在域外的延伸,它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在展开研究时必须把握其“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同时以“世界性文化”视野加以考察,探究其与国内学术文化的关联。目下有关域外汉学家的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的域外译介或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域外评价研究,之所以带给我们的仅限于片断化或“碎片式”认知,甚至重复性的“同质化”认知,原因即在于此。

与此同时,海外中国学研究还有其独特的问题与研究对象,如海外中国学的空间、潮流、趋势,各区域国家中国学之间的知识迁移与纠缠史等,这更是“学科化”研究无法取代的。固然,任何一位学

^① 葛兆光、盛韵:《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

^② 朱政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刍议》,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5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者都只能在一定学科内就海外中国学的某些问题展开研究;但是,从某一学科进入,并不意味着深陷于乃至困守学科之内,还需有超越学科之外的“整体”思想,否则无法获得对海外中国学的整体性认知,正如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在谈论“汉学完整性意识”的重要性时所言,“只有更大的视野才能保持思想的融合力,而完整性正是融合的先决条件。”^①

其三,中国学日趋“世界化”的发展趋向使然。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已然一体化,中国研究开启世界化进程。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即言,“这(汉学研究)新大陆的发现似乎不必看作只是中国学者的惟一遗产和领土。这块不知名的地方正亦不妨公开,使各国学者带他的文化背景所供给的特有知识来到此地通力合作。”^②时至今日,中国学已然“世界化”,呈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③

如何审视世界对中国的书写与解释,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知识构建的“世界化”,意味着解释中国的话语权不再天然地由中国自身所主导。在世界仍为西方话语霸权所充斥的今天,要主导中国的书写与解释,一方面需要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从全球史的视野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与发展,另一方面还必须具有观照自塑与他塑的中国知识的“整体”思想。且不说他者的中国书写可以提供视角或方法的启迪,以深化我们自身对中国的理解和书写;近代以来,他者对中国的阐释即已内化于我们的文化发展与变革之中。清末民初中国学术体系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域外汉学的刺激与推动;^④改革开放后,域外中国书写的涌入则影响乃至形塑着我们的知识生产。^⑤就海外中国学研究本身而言,这种融通的整体性关照则是应有之义,因为我们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服务自身的学术文化建设。故此,以主体性的中国书写为关照,内在地以或取鉴或批判的方式对域外中国书写展开研究,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海外中国学的根本遵循。如此,我们的研究方能真正服务于本土中国知识的世界表达。

三、新时代海外中国学研究如何具化“整体”思想?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言,“在汉学领域发展出这么多的专业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认为,应该对中国有集大成的分析……西方国家很关注,也很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不但想了解数据和事实,还想拥有一个更大的全局观。”^⑥面对中国学的“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及研究的日益“学科化”,如果不保有“整体”的意识,我们将迷失于域外中国知识的“汪洋大海”之中,深陷对域外中国知识的碎片化追求。“整体”思想如何贯之于具体研究?笔者以为,可从以下方面加以努力。

其一,以学术史为进路统摄海外中国学研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曾将历史学视为汉

① Frederick W. Mote, “The Case for 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1964, p. 533.

② Arthur W. Hummel:《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王师韞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9集第101期,1929年10月。

③ 冯契:《冯契文集》第7卷《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2页。

④ 参见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⑤ 参见杨华:《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⑥ 《让世界读懂“学术中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14日。

学研究之母,认为“对(中国)采取非历史的研究取向显然是荒谬的”。^①学术史亦可谓海外中国学研究之母,正如张西平所言,“对这种发生在域外的中国知识沿革史及其汉学家的研究,是一种学术史的研究,如果仅仅从学科内容来展开研究是远远不够的。”^②

何谓学术史?蒋寅认为,学术史“主要是通过整理学科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综合本学科现有的成果,总结学术研究中的经验和教训,揭示杰出学者的贡献,提出悬而未决的问题,最终达到完善学科建设、促进学科发展的目的”,并特别强调“考察学术的真实性”“判断学术的正确性”“揭示学术的独创性”“指出学术的启示性”四个向度的判断。^③在李帆看来,学术史既不同于思想史,亦不等于学科史,其内涵虽难以作出完善的界定,但学者、学术著作、学术传承以及支撑学术演进的学术制度与学术组织等可视为学术史研究的具体对象。^④葛兆光则主张,有意义的学术史所关注的对象应是:学术的转型及其背景和动力,学术研究的趋向、理论、方法,尤其是其主流与潜流及二者关系。^⑤

笔者以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史研究对象,需要综合上述各家的看法,不仅将域外中国学家、著述、组织机构、学术流派与思潮作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亦应将各区域国家的中国学演进史,特别是学术转型作为研究重点,考察转型的背景、动力及推动转型的机构制度,并将汉学家的互动交往及其著述之于各自的学术与社会影响纳入关注的视阈。以学术史进路研究海外中国学,所强调的是“通”,特别是学术理路之通与文化语境理路之通的结合,需要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深入其知识生产的内部,探明其生产和影响的内在与外在机制。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并非简单梳理中国文化元素传入英国的路径及其流布,而是结合历史语境,重点剖析其对启蒙时期英国各界的复杂影响;张杨的《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同样不是作简单概况梳理,而是以“政治与知识”为视角,探析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知识生产之内在动力与机制。诸如此类的研究,不仅深化了研究的学术内涵,亦为建构具有贯通性的认知奠定基础。

其二,以多元路径窥探海外中国学的完整图景。在中国学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域外生产的中国知识呈爆炸式增长。要了解海外中国学的完整图景,笔者以为一方面应打破“学科拜物教”,树立交流融合的意识。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曾指出,“如果一个修养有限的人只会机械地应用某种孤立的‘学科’方法,而这门学科又是狭隘地孕育于某种自我封闭的文化‘模式’或‘体系’(无论是当代的还是‘传统’的),那么往往都会得到呆板甚至荒谬的结果。”^⑥另一方面,文献目录学是不可忽视的方法。例如,通过考狄(Henri Cordier)的《西人论中国书目》和袁同礼的《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便可大体了解16世纪至1958年西方中国研究的概貌。国内学人对于海外中国学文献目录有所努力,但远远不够,亟待加强。目前虽已出版《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海外中国研究中文书目:1978—2018》等,但接续考狄、袁同礼所编的书目仍付之阙如。正因为如

① Rhoads Murphey, “Discussant Remark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1964, pp. 535-536.

② 张西平:《作为专门史的海外汉学》,《国际汉学》2020年第4期。

③ 蒋寅:《学术的年轮》(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04页。

④ 李帆:《学术史的若干省思》,《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4期。

⑤ 葛兆光:《余音:学术史随笔选1992—20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序”,第iv—v页。

⑥ Benjamin Schwartz, “The fetish of the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1964, p. 538.

此,我们对 1958 年以来的海外中国学缺乏总体性认知。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人文知识的获取、分析、集成和展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已有海量的图书、报纸、期刊、照片、视频等人文资料被数字化。面对这种日益强化的数字化情景,我们可以由此展开对海外中国学完整图景的窥探。比如,利用 CiteSpace 软件,通过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追踪及分析,可以将海外中国学的总体性与趋势性“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与呈现。另外,借助数字人文带来的便利,引入概念史的方法,以海外中国学中的重要概念为关键词,探寻其历史演化,分析其后的历史语境与缘由,由此构建起对海外中国学具有贯通性的认知和理解。

其三,以学术对话强化自塑之中国知识的在场。在强调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今天,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应更为突出地强化自塑中国知识的论述。宋月红认为,“长期以来的‘海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以研究海外、国外关于中国的认知为主,虽然依托关于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特别是新中国史研究,但大多数不包含‘以我为主’的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内容,导致中国学研究‘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和传播内容的‘主题性’的薄弱或缺位,这样的中国学以‘他塑’为主,而缺乏‘自塑’及其比较和互鉴,不仅不完整、不具体,更不具有主体性的本源性和原创性。”^①中国学的日益“世界化”,自塑的中国论述当然不应缺席,而且理应成为主角。如其所说,这就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以更大力度呈现自我建构的中国知识,努力使之成为国际中国知识场域的“主角”。

与此同时,笔者以为还应在此基础上提升学术能力,强化学术对话。王国维、陈垣、顾颉刚等人之所以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巨大影响力,除研究的精深外,即在于主动参与国际汉学学术论题,与之展开对话。纯粹单向度的自我论述,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失去文明互鉴之追求。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今天,要强化自我论述的在场,更有赖于深度学术对话中的考辨和批驳。基于此,从事中国本体研究的中国学人,应内在的将域外学人的论著纳入考察视野,以书评或将其作为论著讨论对象等方式对其展开评析;专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则应更为主动地回到本土学术立场,通过提升理解本土的知识能力和思想能力,对“他塑”之中国知识展开应有的批判与取鉴。

总而言之,无论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属性及其发展趋向,还是对已有海外中国学研究知识的挖掘利用,都要求我们保有“整体”思想。这种“整体”思想,不仅将深化海外中国学研究,为建立起具有贯通性的海外中国学认知创造可能性,亦可由此对已有知识与实践展开提炼总结,更好地刺激与推动我们自身学术文化的变革发展,服务于全球化表达的推进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